

李静 主编

ZHONGGUOMINJIAN
WENBEN

中国问题

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以理性以激情以深刻 锋利的诚实 直趋问题
直言主义 真面时世 时弊 时局 开宗明言

Minjian

中国民间文本·民间境界

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 静 主编

中国问题

——来自知识界的声音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中国问题研究丛书



李 静

小 序

《中国问题》是中国知识界表达公共关怀的一本书。

本书在千年交替之际得以完稿,并非一个时间上的偶然。它是一部分国内学者在这一时刻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的理性产物,就像在时间的链条上有意打下的一个结——它便于我们的后代在尘封之中前来辨认,在许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曾经在一个共同的时刻,为那个时代提供过怎样的一份思考、一段描述、一个建议,这些思考、描述和建议与多年以后他们自己的处境有何关联。也许这不是一个无趣的想象,这一想象也表明了我们对 2000 年所做的这件事的坚强信心。关于公元 2000 年的意义,正如一位思想者所说,它意味着“全人类的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一是全球化从不自觉到自觉,二是继上万年的农业文明而主宰了世界二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向近年开始的信息文明转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它则意味着一个更加复杂、具体而关键的开始。

本书名为“中国问题”,是想以此指认一个直面现实的知识人在当下时空里所面对的一切丰富而真实的境遇,以及在这种境遇面前的纯粹“研究者”的态度。诚然,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换言之

之,也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生机勃勃的年代。之所以以“中国问题”名之,乃是因为“改革”、“发展”、“生机勃勃”都是这一命名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改革与发展,就不会产生问题与挑战。一个毫无希望、拒绝变革的时代就不会有问题,而只会有答案。因此,“问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力和希望之所在,而发现、揭示和研究“问题”,则必须诉诸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至于有效地解决问题,则是这个时代更为广大的人们的责任了。

从这本“中国知识界访谈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者们“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理性与激情。因为拥有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所谈论的问题也涉及到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方面。学者们或从传统文化中析出专制主义毒素,追溯不公正的根源;或剖析当下激烈碰撞的社会思潮,重寻知识分子的价值方位;或执著勘探我们时代的精神资源,高扬终极关怀的旗帜;或精确分析当下中国的经济、法治、新闻、教育、环境诸领域潜伏的危机与问题,发掘积极的因素和健康的力量;或预测中国加入 WTO 后将要面临的考验与挑战,以及应对的方式与可能。应该说,这是一次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面向公共空间作的一次集体发言,它追求的是思想的理性深刻与表达方式的通俗畅达,它呼唤着更多的人对中国现实进行理解与思考。

本书源自林贤治先生在 1999 年底的策划和约请,得到了诸位学者和主要采写者萧瀚、萧三郎等先生的巨大支持,以及编辑家许医农先生的热情帮助。如果读者朋友看完此书后说:这是一本真实、理性、富于良知的读物,那么,这种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他们这些可敬的人。

2000 年 3 月 30 日

I 问题与主义

- 5 思想 翻译/何兆武
15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徐友渔
29 文化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职业/李书磊
43 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 /许纪霖
65 我们是否还需要激进? /孙 郁
79 还原鲁迅的思想/王富仁
93 当代中国的“主义”与“问题”/秦 晖

II 精神与时代

- 117 宗教与未来中国/何光沪
133 哲学和时代的问题/张汝伦
149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何怀宏
163 业余政治的时代即将到来/崔卫平
177 时代的精神空白/张 辉

III 改革与发展

- 195 经济文明的冲突与全球化下的“本土化”/汪丁丁
213 20年的改革与未来的危机/杨帆
229 新世纪:农业的危机与挑战/卢锋
247 新世纪经济学的新方向/梁小民
259 司法改革与中国未来/贺卫方
287 法律与法律的未来/江山
299 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新闻改革的必由之路/展江
315 新闻与民意/卢跃刚

IV 忧患与思考

- 333 绿色的忧患/梁从诫
347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
363 性观念的变化趋势/李银河
375 追寻不公正的根源/王毅
395 研究20世纪中国问题的意义与方法/刘建平
408 后记

中国问题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

问

题

与

主

义

001

何兆武简介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何兆武,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003



何兆武简介

ZHONG GUO MIN JIAN WEN BEN

004

何兆武，1921年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思想史（英文）》、《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书。

受访人：●何兆武

采访人：○丁 东

思想 翻译

○何先生,20世纪即将结束,请您对世纪末中国的思想走势作一个基本估计。

● 中国近代遇到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中国内部也有动乱,外部则无非是落后的民族征服汉族,没有遇到过更高的优势文化的挑战。近代西方不光是武力比中国强,船坚炮利,他还有文化上的优势,比如科学技术。一开始我们意识到船坚炮利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后来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文化的产物,它有文化的背景、思想的背景、社会制度的背景。从晚清起,到戊戌变法,是第一次思想认识上的深入。第二次是“五四”,民国成立以后,挂了招牌,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起色。巴黎和会使我们受到政治上的刺激,但“五四”不仅止于此,还有一个文化上的觉醒,打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现在对“五四”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倾向于否定“五四”,说“五四”对传统否定得太多了,是一种偏激。我不同意这样看。我认为“五四”基本上应当肯定,那是中国思想上的一次觉醒。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后来向左转了,当然战争年代需要有一种思想理论的支撑,过了头,过犹不及,就产生负面的影响。好比人有病要吃药,药吃多了也有负作用。过头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一律当成封建的东西全盘否定。到“文革”时期最显著了。所有西方的

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腐朽的,都不要了。解放以后很多年,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都是内部发行,不能公开,把马克思以后的东西都当成反动的了。我想,学术思想不能那么简单,不光资产阶级,就是封建阶级学者,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乾嘉学派是单纯考据,考据也不是没有价值。马克思以后已经一个半世纪了,这一个半世纪,西方科学技术有巨大的进步,思想理论方面也有深刻的考虑,我们不能简单地都说成腐朽的、没落的。你不借鉴,自己就不能进步。好比写文章,别人的文章你都不看,闭门造车,那你也写不好。

80年代,中国第三次向西方开放,也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中青年,不考虑中国的传统,实际上是以西方现代的思想如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等为经典,和梁启超说的清朝末年一样,经过一段学问的饥渴,有什么都吃,这是当代的一种潮流;还有一种潮流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简单地重复自己从前的话,这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怎样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恐怕还得一个时期才能摸索到。现在好像是各行其道,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互不相干。学术问题嘛,大家总要有交流,也要有争论。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入正轨,总得经过一段时期。这是我的粗浅的印象。

我想,无论任何时代,对于任何民族、任何社会,要想求得学术思想的健康发展,第一要继承传统,不能一棍子打死,无论是中国的旧传统,还是西方近代的传统,都不能全盘否定,总应当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即使它并不完全正确,也应当吸收它有价值的成分,就像人吃东西不可能完全吸收一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而我们的历史学论文,就很少有作心理分析的。对历史人物,过去是停留在概念的阶段上,好像把他的阶级属性一定,就完事了。诸如某人是资产阶级,一定是惟利是图的;是无产阶级,一定是大公无私的。这就抽象化了。毕竟一个具体的人应有具体的心理活动,而这些都是都没有了。写小说,也要有具体的心理活动,否则就是流水账、起居录了。

○ 前些天和您一起去看望 93 岁的许汉三先生,您当时建议他写

回忆录,如果不能写,就用录音机口述。您这样重视当代人的回忆,基于一种什么考虑?

● 重要的人物应当写回忆录,非常值得写。但在我们国家,越是重要的人物,越不大好写。比如,江青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有找人让她口述整理,可惜了。一部“文革”史,她是最重要的人物了。王光美还活着,不知她肯不肯写。不重要的人物,小人物,也可以写。军国大事他不知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写出对社会历史的感受。过去也有这样的例子,《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作者,自己并不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写下来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侧面。小人物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大侧面。毕竟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大人物写的是一个侧面,小人物写的也是一个侧面。

○ 去年我和高增德先生为编《世纪学人自述》约稿,您写的自述里有一段话:“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种动物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惟独对于文科来说,它却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和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 研究人和研究自然界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家可以做实验,比如研究一种金属,多高的温度才能熔化,可以实验,3000度不行,可以来5000度。但研究人却没法做实验。比如研究人能够经受多大的压力,就不能实验。我相信,随着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压垮,坚持到最后压不垮的可能也有,那是极少数。究竟人能承受

多大压力？四清的时候，我就见过，让一个人承认是贪污分子，他不承认，就关起来，让他老实交待。他没办法，只好承认贪污了一千斤粮食。还不行，又长到五千斤，一万斤。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度的。太平时期不可能做人性的实验，除非在极其动荡的时候，这对人文科学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生活在太平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当然很幸福，但年年生活是一样的，什么特殊事件都没有，人性的表现反而是平淡的。

○ 现在中国史学的现实，恰恰“文革”研究空白很多。

● 过去思想理论界有一种模式，大家都按一种模式想问题。简单地说，都按 1938 年斯大林总结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成了经典，苏联教科书都是这种模式。50 年代我们全面学习苏联，这种模式又搬到中国。和苏联闹翻以后，中国发表过“九评”，其实那就代表毛泽东的想法。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一种是印成书的，一种是没有印成书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写成文字，写成书的，还有一种是没写出来的，那也是他的思想，他就是那么干的。虽没有写成书，但实际指导思想是那个。研究人的思想确实应当两方面结合起来看。人说的和干的难免不一样。

○ 现在研究历史，习惯于凭文字记载，凭报刊文献。一个人也好，一个时代也好，实际情况和当时的文字记载有很大距离。您说的个人回忆，倒是对这种距离的一个补充。

● 对。个人的回忆是对当时文字记载的一种补充，说真话是补充，说假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补充。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有人不满意，说他在关键的地方轻描淡写，和“四人帮”的关系一带而过。但这也反映他思想的真实。他不愿意多说。

○ 一些人对冯先生有意见，主要是指梁效写作组的经历。其实

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还有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对这件事是写了,别的有同样经历的人都不提这一段。社会舆论对他们谴责很严厉,其实他们承担不了那么多责任。

● 当时不但他们,哪位都一样,谁敢不识抬举?

○ 当时能找借口不参加写作组的学者是极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在建国以后为执政者服务,都是怕服务不上。所以对冯先生、周先生不应过于苛责。他们进了写作组,执政者是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说他们参与了什么阴谋,我想未见得。他们被利用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

● 我也同意你说的,不应专门对他们苛责。“文革”中那么多整过的人,也没有都要求他们反思检讨。这又使我想起一些重要的人死了,悼念时都有一句,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有的其实不符合事实。如果都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怎么会长时间被“四人帮”专了政?当时是有很多人挨整,也有很多人整人。有的人挨过整,也整过人。挨整的人都诉苦,整人的都不说整人。那时局面变动太快,有人红一阵就垮。我们历史上有个“史绍宾”,有一阵也是非常之红,批人的时候气势汹汹,转眼就垮了,也是过眼烟云。

○ 有些“文革”中红过的人写了回忆,或者接受了采访,受到舆论的批评。如果他们的回忆不实,应当批评。但不应当不让他们回忆。知识界应当建立一种理念,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权说话。

● 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看到一本杂志,唐君毅接受访问,记者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大陆的知识分子挨整?他说知道,他们应该挨整。大陆知识分子太没有骨气了,所以应该挨整,大意是这样。有一次我和李泽厚聊起这件事,他笑了,说,让他在这儿试试。

○ 您前些时候发表文章提到学派,想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 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学派,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因背景不同,受的训练不同,每个人的思想也不同,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与政治组织不同,政治组织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学派无非是人们思想言论有共同之点,这样就形成了学派。学派之间有时很难划分,有时是由于人们思想靠近而形成学派,有时人们的思想又未必十分靠近,只是有一定的关系,或多少受他的影响,就说是一个学派。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已习惯于批判,如批判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另外一种情况。比如在西方,有的人自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也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种情形多得很。比如今天炒得很热的新儒家。大概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学者并不自认为是儒家,可是他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受到儒家的影响,包括胡适,人家不算他是新儒家,他也不自命是新儒家,可是胡适有没有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呢,我想肯定也是有的,而且还很多,比如他到美国去留学,有过恋爱,可没在美国结婚,仍然要家乡的原配,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在今天的西方,这种情况也大量存在,如最有名的法国年鉴派,就受马克思主义很大的影响,但年鉴派并不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这种东西不可能有一刀切的界线,即便是我们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受其他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曾说自己年轻时读的是孔孟的书,后来又读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到后来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分析起来,在毛的思想里,就不可能一丝一毫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都没有,思想总是在无形之中渗透的。思想和政治组织毕竟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思想,既不能仅仅依据他参加过什么组织,也不能仅仅依据他曾接受过什么思想,这是很难划分得清的。我上小学和中学时,国文学过古代的、当代的、鲁迅的、胡适的,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必然受到影响,但受到什么程度,很难作定量的分析。胡适可算作一派,他的弟子、门徒也多,但没有一个组织形式。所谓学派,无非是某些人关系密切一点,或是有什么共同之点、共同言语,就

算是一个学派了。比如傅斯年,算是胡适派,可是傅与胡也闹过争论,所以这是很难讲的。

学派本身是流动不居的。比如孔夫子死了,传有八派,各不相同,还有再传弟子,必然又各不相同。不会完全都一样,如果都是百分之百的原装,那历史就没有发展了。你有几个学生,他们不会都一样,再传学生更不会一样,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人也不同了。宗教信仰有原教旨主义,坚持某一个教条,绝对不能变,但毕竟不能算学术思想。我认为学术思想不应该这样,否则学术思想就没有进步。作为学术思想来说,无论是中国的四书五经也好,西方的《圣经》也好,我们都不能说它句句是真理,都可以批判。

解放以后历史学界有五老,其中四老都没有学生,没有班子,只有侯外庐先生有学生,有班子,自然形成一个学派。现在侯先生不在了,学派情况也不同了,学生们的路数跟他也不完全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基础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必然会不一样的。侯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大限度的原装,我们都是多少有点改装了的。改装就是力求符合今天的需要,未必是马克思的原意。我觉得,包括毛泽东在内,有很多东西,也可以说不符合马克思原意,比如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意识上对于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970年是贝多芬诞辰200周年,全世界都在隆重地纪念,包括前苏联,三驾马车都出席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我们提都不提。马克思本人对于那些文化名人是评价非常高的,对莎士比亚、贝多芬都是这样。中国这一“全面专政”,弄得莎士比亚、贝多芬都不要了,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对这些文化名人,没有把他们划分成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也没有进行全面专政的意思。马克思著作中还常常作为正面材料来引用莎士比亚的诗。

学术思想与政治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只看到它有关系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不同的一面,是不行的。毛泽东曾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说过,纯属于科学问题由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不要用行政命令去干涉。假如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有价值的话,可以资助一点、鼓励一点,但不要用行政手段或命令来干预或判决。军队一下命